

英语世界中的《淮南子》选译研究： 从“《老子》注脚”到“主题研译”

程 跃^{1,2}

(1. 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2.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淮南子》成书于西汉初期,是汉初承续先秦,力求集各家之大成的鸿篇巨制,也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前,最后一部具有思想大综合特征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历史具有重要价值。英语世界对《淮南子》的译介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140余年的历史。在这期间,选译是《淮南子》译介的主流形式,有效地推动了《淮南子》在英语世界的研究与传播。英语世界中的《淮南子》选译活动经历了“《老子》注脚”与“主题研译”两个阶段,显示出清晰的发展脉络以及“研译一体”的基本特征,反映了不同历史条件下英语世界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态度与认知水平。对选译本的研究不仅可以挖掘《淮南子》典籍的多维价值及当代意义,也有利于揭示汉学翻译与汉学研究间的互动关系,为国内的古代典籍外译活动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淮南子》;选译本;英语世界;研译一体

中图分类号: H315.9

《淮南子》成书于西汉初期,是汉初承续先秦,力求集各家之大成的鸿篇巨制,被现代著名学者胡适誉为“结古代思想之总账”的“绝代奇书”^{[1]2}。英语世界对《淮南子》的译介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其后140余年中共产生全译本1部(及其精简本1部),选译本9部,此外还有独立的《淮南子·原道训》选译文1篇。可以说,选译是英语世界中《淮南子》译介的主流形式。在全译本出版之前,《淮南子》21篇中,已有14篇以选译的形式被译介到英语世界。国内学者对《淮南子》英译活动的研究集中出现于2000年之后,现有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译者《淮南子》英译本及其传播情况的梳理和介绍,如戴黍^[2],丁立福^[3],孟庆波、高旭^[4]等;二是从翻译学角度,对2010年出版的英语世界唯一一部《淮南子》全译本的个案研究,如丁立福^[5-8],陈云会^[9],杨凯^[10],谭小菊^[11]等。近年来又出现借助语料库开展研究的新趋势,如丁立福^[12],刘睿^[13]等。这些成果总体上厘清了《淮南子》在海外的译介脉络,对全译本的翻译特色和价值也形成了基本的认识,但对选译本(文)主要还是

停留在文献梳理和介绍层面,对其译介背景、译本特色、翻译策略等鲜有专门研究。作为英语世界《淮南子》译介的主流形式,对选译活动的研究能够凸显西方译者《淮南子》译介的深沉动因以及对《淮南子》思想认识的演变,有益于在西方汉学的视域中评价《淮南子》的多维价值,重新认识《淮南子》在西方译介的历史。本文在现有《淮南子》英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英语世界中的《淮南子》选译活动,探索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语境以及在翻译和诠释方面的特征,进一步揭示选译活动对《淮南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

一、《老子》注脚:英国宗教人士的《淮南子》早期选译活动

《淮南子》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始于19世纪80年代。最初《淮南子》是以“道教经籍”的面貌走进英语世界的。《淮南子》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进入西方译者的视野,与当时英语世界比较宗教学的发

收稿日期:2022-12-19;修回日期:2023-02-06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西方汉学视域中的《淮南子》英译研究”(K2019A0086);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淮南子》道家性命哲学研究”(SK2020ZD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淮南子》翻译问题研究”(22YJA740007)

作者简介:程跃,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海外汉学研究与典籍翻译。

E-mail: cyaust@126.com

引文格式:程跃. 英语世界中的《淮南子》选译研究:从“《老子》注脚”到“主题研译”[J].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1): 20-26.

展以及对中国道家道教思想的研究有关。《淮南子》中的对道的论述使西方译者看到了其与道家原始经典《老子》的密切关联,两种《淮南子》翻译成果分别诞生于19世纪80年代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两次西方“老子热”之中。他们将《淮南子》视为《老子》思想的注脚,关注的是其中对道家思想最高范畴“道”的阐释以及道与万物、道与人生的关系。

(一)“老子热”与《淮南子》选译的发端

与长期居于中国思想界主流的儒家经典相比,道家典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起步相对较晚。直到19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比较宗教学兴起、汉学发展以及英国在华政治、经济、外交利益扩大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部分新教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开始研究中国道家思想,向西方传译道家经典。伴随着这一过程,英语世界对于老子其人其书以及道家思想核心概念“道”的研究和论争也逐渐展开。在1868年至1905年间,英语世界出现了第一次翻译和研究《老子》的高潮^[14],其他一些道家道教经典,如《庄子》《太上感应篇》等在此过程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译介。1881年,《庄子》英译第一人、有“道经译介拓荒者”^[15]之称的英国宗教学者福斐礼(Frederic Henry Balfour)翻译《原道训》一篇发表于《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之上^[16],后被收录到其本人的译文集《道教经典》^[17]之中,成为《淮南子》英译的滥觞。福斐礼的道经翻译与研究,接续法国学者雷慕莎(Rémusat)、儒莲(Stanislas Julien),英国学者湛约翰(John Chalmers),其译本对同时代的理雅各(James Legge)、翟理斯(Herbert Giles)等亦有影响,是英国道教学初创阶段的重要人物。19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的道家道教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文献翻译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原道训》成为《淮南子》21篇中最早被译介到英语世界中的篇章,绝非偶然。作为《淮南子》的第一篇,《原道训》是全书的道论基础,对《老子》之道进行了细致的推衍与阐发。福斐礼之所以翻译《原道训》,是因为其中所包含的对“道”的描述,可以作為其理解和诠释道家道教思想的资源。福斐礼在《道教经典》一书的前言中,大段引用《淮南子》以及《老子》《庄子》中对“道”的描述,从中归纳“道”的特征。福斐礼的《原道训》译文仅有20余条简短的注释,也没有提供专门的导言或后记,可见他并未针对《原道训》开展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而只是将其笼统地看作道教经籍的一种,通过阅读与翻译《原道训》,帮助其回答“道为何”的问题。

《淮南子》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英语选译本诞生于1933年。当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西

方社会遭遇了普遍的信仰危机,西方知识界掉头东顾,冀望从古老的东方文明中找到解决危机的智慧,逐渐形成了第二次《老子》翻译的热潮^[14]。与此同时,进入20世纪后,随着西方对中国知识的了解以及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积累,西方学者对中国典籍的研究也开始转向更加具体问题的讨论和更多的个案研究。在此背景下,《淮南子》译介也出现了新的成果。20世纪20~30年代,在华工作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莫安仁(Evan S. Morgan)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年会上接连宣读了《道应训》^[18]与《原道训》^[19]译文以及论文《道教神仙》^[20],这些成果后被收录到《会刊》之中,引起了当时听众和读者兴趣,极大地鼓舞了莫安仁的《淮南子》翻译和研究热情^[21]。1933年,莫安仁出版《淮南子》选译本《大道鸿烈》^{①[21]},包括对《原道训》《俶真训》《精神训》《本经训》《道应训》《汜论训》《兵略训》《修务训》8篇的翻译和研究。莫安仁在译本的前言和引言中多次强调,《淮南子》与老子思想密切关联,并在译本引言的第一节中,介绍了老子的生平、所处时代,并从宇宙论、生命论、内修术、道德体系、政治思想、战争观6个方面详细介绍了老子思想的内容。莫安仁指出:“淮南子的著作和其哲学思想深深根植于传说中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因此,要更好地理解《淮南子》,就必须熟悉老子。”^[21]将老子思想作为解读《淮南子》的关键是莫安仁译本的突出特征。

(二)两种诠释视角:自然主义哲学与精神主宰论

福斐礼翻译《原道训》第一次将《淮南子》介绍到英语世界,开启了《淮南子》在英语世界中翻译和研究的历史。19世纪80年代,西方对中国道家思想的认识十分有限,基本还停留在与儒家思想的宏观对比之上。作为“道经译介的拓荒者”,福斐礼所进行的道经翻译在当时具有开拓性,可以参考和对比的资料很少。不仅如此,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淮南子》的研究也仅停留在文字校勘、训诂层面,没有系统深入的思想研究。福斐礼在翻译时,所能参考的只有高诱的原注。整体而言,福斐礼的《原道训》译文较为粗浅,流于表面。在西方汉学对道家道教思想传统缺乏整体深入研究的情况下,福斐礼不可能认识到《淮南子》道论对《老子》道论的转化。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依据字面之意,对文本做出自己的理解。福斐礼在研究中体现出了明显的比较宗教学意识。他认为儒家是理性主义的,是“中国的苏格拉底学派”;道家是自然主义的,“因为道家在本质上遵循自然——不管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形而上学层面,都将其置于最高位置。”^[22]从自然

主义哲学的视角出发,福斐礼将道译为“自然”(Nature)或“自然法则”(Natural Principle),认为道是存在于万物背后的“抽象的因,生命和秩序的初始原则;它是现象的本是(the hypostatic quiddity),而现象则是它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道就是“产生自然的自然”(Nature naturans),作为原因的自然;相对而言“万物”则是“被自然产生的自然”(Nature naturata)^{[17]vi}。

相比福斐礼以自然主义哲学为基础所进行的理解与阐释,莫安仁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视角来解读《淮南子》思想。他将道家思想体系中的“有”“无”理解为有形、无形,将“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理解为万物属于有形世界,道属于无形世界,将道与万物分割开来,归为“无形”与“有形”,即“精神”与“物质”两个范畴。福斐礼创造性地将“道”翻译为“宇宙精神”(Cosmic Spirit),认为道家思想所主张的是一种精神性的起源,将道视为推动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独立的精神实体。这种将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相分离的理解,取消了原文本中的气化宇宙论——道以气为载体,化生万物,寓于万物之中的思想。从宏观大宇宙衍生到人体小宇宙,在生命论层面,莫安仁将《淮南子》中“形气神”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转化为精神与肉体相分离,精神世界对感官世界的主宰。通过莫安仁的阐释,《淮南子》中“气”的宇宙观和生命观成了西方哲学中的“精神主宰论”的另一种表达。将道翻译为“宇宙精神”,用莫安仁自己的话说,这种译法虽然有一些冒险,但“可以综合地体现和表达中国思想中‘道’的含义”^{[21]244},“看起来已包含了‘道’在原典中的所有内涵。”^{[21]vii}莫安仁以西方哲学为诠释资源,目的是将被原文模糊含混的道家哲学语言

所隐藏的意义,明确地传递出来。莫安仁认为,《淮南子》的价值来自蕴藏在表层语言之下的意义。中文言简意丰,必须加以解释,才能将意义清晰地表达出来。因此,他采用“释译”(paraphrase)的翻译策略,将原文思想“解释”给读者。译文的自由度很高,融入了大量译者自己的阐释,译本与原典的思想已经相距甚远^{[23]305}。

总的来说,早期两位译者没有重复19世纪早期新教传教士为了维护基督教传统,以耶释道,将“道”翻译为“God”或将“夷、希、微”附会为“耶和華”的老路。而是在比较宗教学的影响下,以文本为依据,发掘道的特性,再以西方哲学概念,作为接引,与之融通,构建交流的基础。早期两位译者受制于西方汉学道家研究整体学术水平的限制,译本中存在着许多知识性谬误和理解上的偏差。以西方哲学诠释道家思想的过程也存在着许多似是而非的情形。这一时期,英语世界主要是将《淮南子》笼统地视为道家文献的一种,《老子》思想的注脚,翻译的目的在于借助《淮南子》来研究道家思想,对《淮南子》本身的探究和认识十分有限。

二、主题研译：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欧美汉学家对《淮南子》的选译与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国际汉学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向北美,《淮南子》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也进入新的阶段,翻译与研究的关系更加紧密,取得了较大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共诞生《淮南子》选译本7部(表1)。主题性与学术性是这一时期选译本的突出特征。

表1 20世纪60~90年代《淮南子》英语选译本情况

出版年份	译者	译本名称	翻译篇章	研究主题	出版机构
1962	[美]华立克	《〈淮南子〉第十一篇:行为、文化与宇宙》	《齐俗训》	礼俗史	美国东方学会
1983	[美]安乐哲	《统治的艺术: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	《主术训》	治国思想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1985	[加]白光华	《〈淮南子〉:汉代早期思想中的哲学综合》	《览冥训》	感应理论	香港大学出版社
1993	[美]马绛	《汉代早期思想中的天与地:〈淮南子〉第三、四、五篇研究》	《天文训》《地形训》 《时则训》	宇宙论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98	刘殿爵、 [美]安乐哲	《原道:追寻道之源》	《原道训》	道论	巴兰坦图书公司
1998	[英]雷敦和	《汉代和平哲学:〈淮南子·兵略训〉研究》	《兵略训》	和平哲学	台北利氏出版社
2012	[美]麦安迪	《兵道:刘安的战争艺术》	《兵略训》	军事思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一) 译介动因

总体来说,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淮南子》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研究受两大历史事件的推动。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重新认识中国的需要,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研究的投入,为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参考。尽管战后美国更加倾向于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但对古代中国的研究也没有停滞。随着“西方中心观”向“中国中心观”的转移,尤其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又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借助中国古代文献增进对中国社会、历史、思想根源的了解,多就某一主题进行深入研究,获取关于中国的知识,同时也以此来反观自身文化。汉代是中华民族精神、思维模式、文化传统形成的关键时期。《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早期,是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的最后一部思想大综合的著作,可以反映出中华思想由先秦向汉代的转变;而《淮南子》中主题丰富,涉及道论、宇宙论、修养论、政治哲学、礼仪风俗、军事思想等方方面面,可谓“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24]1240},为西方学界透视汉初历史,认识古代中国,开展多主题、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尤其是中西文化、思想、哲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与学术论题。二是,20 世纪 70 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引起了西方汉学界对于“黄老思想”的兴趣以及对道家起源问题的重新认识。《淮南子》由于内容与被中国学者唐兰认定为《黄帝四经》的出土文献的相似性,得到了英语世界研究者的关注。汉墓帛书的出土,不仅引起了西方学界对《淮南子》思想倾向的分析和学派归属的讨论,而且“借助其中的一些文本,也可以帮助理解《淮南子》文本中的难解之处”^{[25]xvi},此外,这一时期美国布朗大学教授罗浩(Harold Roth)对《淮南子》版本流传历史的研究、中国台湾于大成教授对《淮南子》的文本研究及校勘以及刘殿爵、陈方正《淮南子逐字索引》的出版,为解决《淮南子》翻译底本的问题提供了极大助力。徐复观等人对《淮南子》思想及两汉思想史的研究、日本学者金谷治(Kanaya Osamu)等人的《淮南子》文本注释及日语译本,也为英语世界中《淮南子》译者提供了重要参考,促进了《淮南子》选译本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集中出现。

从译者身份来看,7 部选译本译者均为“学者型”译者,都曾在大学中担任教职,且大部分有过在中国学习或工作的经历,与中国文化有直接深入的接触。他们之所以选择翻译《淮南子》,除了受当时

汉学学术潮流的影响之外,个人的学术旨趣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白光华(Charles Le Blanc)最初的研究对象是西方哲学。后来逐渐认识到“要达到了解与掌握比较完全的哲学的目标,只研究西方哲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研究一下西洋之外的一些哲学传统,必须学一些与西方哲学最具差别的哲学”。在他看来,“只有中国才是具有最不同于西洋文化传统的唯一的国度”,他选择了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最具哲学意味的道家”作为其研究中国哲学的切入点。而之所以将《淮南子》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不仅因为相比《老子》《庄子》而言,《淮南子》中“论述性、阐释性语句较多”相对易读,更为重要的是其本人“对中国西汉社会与思想的浓厚兴趣”^[26]。另外,有些译者为了扩大西方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认识,刻意寻找一些尚未引起西方关注的新材料进行研究和翻译,如安乐哲(Roger T. Ames)表示希望通过翻译之前从未被翻译过的《主术训》,来增加对中国哲学的理解^{[25]xxi}。雷敦和(Edmund Ryder)也认为,对尚未被人们所知的中国古代文献开展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哲学的认识。因此,他选择当时还未引起西方学界关注的《兵略训》一篇作为研究和翻译的对象^{[27]2}。

(二) 汉学研究与汉学翻译的互动

早期两位译者将《淮南子》简单地视为《老子》思想的注脚,从比较宗教学视角出发,借助《淮南子》文本开展道家道教思想研究,关注其中对“道”等道家思想核心概念的论述,对《淮南子》本身尚没有展开系统的研究,无法触及《淮南子》中思想来源的复杂性、主题的丰富性等重要问题。二战后,西方汉学整体学术水平的进步以及对中国先秦诸子思想及汉代早期研究成果的积累,为西方学者的《淮南子》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淮南子》作为汉初一部重要的思想文献,深植于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以及汉初时代背景之中,要想准确把握《淮南子》文本的思想内涵,对《淮南子》成书历史背景等相关内容的研究必不可少。从 20 世纪 60 年代华立克(Benjamin E. Wallacker)翻译《齐俗训》以来,选译本译者对《淮南子》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深入的过程,逐渐厘清了《淮南子》作者、编撰方式、汉初政治背景、版本流传、引文来源、学派归属、篇章结构等问题。这些研究一方面为文本解读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在译本中建构了原典的思想语境,为异国读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扫除了理解的障碍。

不同于福斐礼仅依据字面之意的翻译,或莫安

仁过于自由化的诠释,这一时期译者的翻译是建立在对《淮南子》整体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从底本的校释,字句的理解,到思想的解读都具有深刻的学理基础。译文配合大量的导言、注释、评注等内容,融翻译与阐释为一体,将译者对原文的思想解读传递给译文读者。西方译者以研究为翻译的基础,同时译文又是译者学术观点的体现。例如,安乐哲在《原道训》译本中,将道翻译为“the way-making”,反映了他将道视为整个世界的复杂发生过程的观点。马绛(John S. Major)主张将“五行”译为“five phases”,来代替传统译法“five elements”。原因在于,通过对《淮南子》中气化宇宙论的深入研究,马绛认为《淮南子》中“五行”并非指构成万物的5种元素,而是指气的5种状态。如果将“五行”译为“five elements”,很容易让西方读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中组成万物的四元素,从而造成对中国哲学的误解。麦安迪在《兵略训》译本中,将“势”理解为由军队、阵型,或情势所形成的战斗力,认为它是所有内在因素(包括武器及士兵训练水平等)和外在此因素(包括占据制高点、发动奇袭等)的综合。他将“势”翻译为“force”,主要是基于物理学上,力(force)这一函数,包含了内在因素(质量)和外在此因素(加速度)两个方面^{[28]22-23}。这种译法显示出译者以“力”解“势”,着眼于“势”的最终呈现效果,并试图传递出“势”来源于内外两重因素的用意。

此外,不同译者对同一篇章不同视角的解读,也直接反映在翻译之中。下文以《兵略训》为例说明。《兵略训》是《淮南子》中的军事专篇,也是汉代重要的军事文献。英国学者雷敦和与美国历史学家麦安迪(Edmund Ryder)先后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与翻译。雷敦和以《兵略训》为借镜,将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与现代和平研究相结合,对西方和平主义思想以及人道主义军事干涉理论进行反思,对现实中以“人道主义”为名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批判;麦安迪从古代军事思想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将《兵略训》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进行解读,展示了《兵略训》从先秦到汉初军事思想的转变。在译文中,雷敦和采用“justice”翻译“义”,以“just war”对应“义战”,这种译法非常容易让西方读者联想起在他们眼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正义”概念以及“正义战争理论”(the Just War Theory),突出了《兵略训》中“以义用兵”观念的普遍性意义;而麦安迪基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考察,选择更加注重道德含义的“rightness”,揭示出中国古代义战思想中的道德因素,凸显《兵略训》与先秦思想传统的关联。

可以说,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国汉学家为主的英语世界译者,在西方汉学学术潮流和整体研究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研究旨趣,从思想史或哲学研究的视角出发,对《淮南子》中的篇章展开了主题性研究。译者深入到《淮南子》成书的历史语境、版本流传、学派传承,特别是文本思想的研究之中,以此作为理解和翻译的基础,呈现出翻译与研究的深度融合。

三、《淮南子》选译活动的意义

选译本形式灵活,视角多样,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选译本专注于对《淮南子》不同章节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译注,推动了《淮南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选译本提供了关于中国的知识,增进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汉初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的认知,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理解与沟通。译本中所包含的其他相关材料的译文,如华立克译本中的《高诱序》译文、雷敦和对淮南王刘安《谏伐闽越书》的翻译,补充了海外《淮南子》研究以及汉代研究的文献。

从选译本与全译本的关系来看,在西方汉学《淮南子》翻译与研究的历史中,2010年全译本的出版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突破。全译本极大地推动了《淮南子》在西方的关注与传播,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学者对海外《淮南子》译介的关注。国内外学者都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全译本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选译本中的研究观点、译文为全译本提供了重要参考。全译本中导言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就其涉及的论题而言,没有超过选译本的范围。全译本译者从全书思想脉络的连贯性与统一性出发,对选译本中的相关结论进行了统合、批评与深化。可以说,主题不同、视角各异的选译本为全译本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全译本则是对140年以来英语世界《淮南子》选译活动的总结与发展。

选译本中论述的许多问题,成为后续研究的课题,开辟了西方汉学汉代早期思想史研究及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例如,前文所述马绛对“五行”的翻译,引起了其他汉学家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在马绛之后,昆斯特(Richard A. Kunst)^[29]、弗雷德里希(Michael Friedrich)及拉克内(Michael Lackner)^[30]等人相继撰文对“五行”的内涵及译名进行讨论。他们之间的论争,深化了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关联思维以及汉代气化宇宙论的认识,推动了中西方思

想的比较研究。此外,译本中对《淮南子》学派归属、引文来源、文本结构的讨论后来都发展为独立的学术问题,推动了《淮南子》与秦汉时期作品如《吕氏春秋》《盐铁论》《春秋繁露》等的比较研究,促进了西方汉学中国古代研究的发展。

此外,西方学者在《淮南子》研究与翻译的过程中,尤其注重建立中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对话。马绛以《淮南子》宇宙论3篇为基础,对中国关联宇宙论与西方机械宇宙论展开对比分析,提出“西方的观点,因其孕育出现代科学而受到人们的充分关注。……但对中国文明中的宇宙观和自然哲学的长期忽视,实际上是忽略了人类遗产中的一个重要方面”^[31]。刘殿爵、安乐哲在《原道训》译本中将道家“谱系性宇宙生成论”与西方“形而上的宇宙生成论”进行比较,认为二者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宇宙产生于一些超越性的原则中,其中“最基本而具有决定性的原则是独立于其所创造的世界之外”;后者认为“世界是‘自然’(self-soing)的,也就是自动产生的,这一过程自身本然地具有一种转化的力量,而并没有外因使然”^[32]¹³⁻¹⁶。“因此,古代中国的自然宇宙论中并没有一个单一秩序的宇宙,而是倾向于将宇宙理解为一个动态的‘世界’。”^[33]⁷²雷敦和通过《兵略训》中中国古代“义战”思想,展开了对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以及当代人道主义武装干涉思想及实践的反思。通过这样的比较与对话,《淮南子》不仅成为西方认识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的窗口,同时也是西方反思自我的学术之镜以及推动自身文化横向开拓的思想之源。

四、结语

从1881年福斐礼翻译《原道训》到2012年麦安迪《兵略训》译本,回顾《淮南子》在英语世界译介的全过程可以发现,选译是英语世界《淮南子》译介的主流形式。《淮南子》中“囊括诸子百家的丰富内容及精研时势人事的深刻思想”^[34]¹,使它成为英语世界透视汉初不同思想主题的丰富资源,推动了其在西方的传播。英语世界中的《淮南子》选译活动,经历了由“《老子》注脚”到“主题研译”的演变,译者身份由宗教学者、传教士转向专业汉学研究者,译介视角由道家道教研究转向思想史研究和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英语世界学者对《淮南子》进行的翻译和研究,是在西方学术语境中进行的,本质上是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典籍及中国思想研究成果的一种,与西方社会思想及学术思潮的演进、西

方汉学整体学术发展以及认识中国的需求密不可分,同时也反映出译者个人的研究旨趣和学术水平。就《淮南子》这类大部头典籍而言,选译本在灵活性、针对性、深入性方面更具优势,可以有效推动《淮南子》在海外的研究和传播,以及中西文明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译介形式。

注释:

- ① 关于该译本的名称“Tao, the Great Luminant”,曾有译者将其回译为《道——最高的精神》或《道之大化》。本文认为,“Great”意为“大”“鸿”;“Luminant”意为“明”“烈”。“Great Luminant”对应中文“鸿烈”,基于此,本文使用《大道鸿烈》作为该译本的中文名。

参考文献:

- [1]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 戴黍. 国外的《淮南子》研究[J]. 哲学动态,2003(4): 44-47.
- [3] 丁立福. 《淮南子》对外译介传播研究[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6(3):72-78.
- [4] 孟庆波,高旭. 西方汉学中的《淮南子》翻译与研究——基于英文书籍的文献史考察[J]. 国际汉学,2018(3):58-72.
- [5] 丁立福. 国内外《淮南子》英译出版及学界接受对比研究——以国内全译本 *Huai Nan Zi* 和国外全译本 *The Huainanzi* 为例[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4): 53-58.
- [6] 丁立福. 中国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典籍顺译范例:《淮南子》翻译研究[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88-93.
- [7] 丁立福. 中、外英译《淮南子》副文本风格对比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9.
- [8] 丁立福. 论中国典籍译介之“门槛”——以《淮南子》英译为例[J]. 北京社会科学,2019(6):4-14.
- [9] 陈云会. 再现理论视阈下《淮南子》首个英文全译本研究[D].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2015.
- [10] 杨凯. “丰厚翻译”视角下的约翰·梅杰《淮南子》英译本研究[J]. 湘南学院学报,2016(6):64-77.
- [11] 谭小菊. “整合适应选择度”标准下《淮南子》中医养生术语英译比较研究[D]. 西安:西安理工大学,2019.
- [12] 丁立福. 论《淮南子》译介研究新成果及其汉英平行语料库研制[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6): 67-74.
- [13] 刘睿. 基于语料库计量语言特征的译者风格研究——以《淮南子·时则训》三译本为例[J]. 文化学刊,2020(10): 159-162.
- [14] 辛红娟,高圣兵. 追寻老子的踪迹——《道德经》英语译本的历时描述[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1): 79-84.
- [15] 俞森林著,潘显一序. 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2015.
- [16] Balfour F H. The Principle of Nature: a Chapter from the “Histo-

- ry of Great Light" by Huai-Nan-Tze, Prince of Kiang-Ling" [J]. China Review, 1881(9): 281–297.
- [17] Balfour F H. Taoist Texts: Ethical,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M]. London: Trubner, 1884; Shanghai: Kelly & Walsh, 1884.
- [18] Morgan E S. The Operations and Manifestations of the Tao Exemplified in History, or the Tao confirmed by history [J].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1(52): 1–39.
- [19] Morgan E S. Cosmic Spirit: its nature, operations and influence [J].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1(61): 179–197.
- [20] Morgan E S. Taoist Superman [J].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3(54): 29–45.
- [21] Morgan E S. Tao, the Great Luminant; Essays from the Huai Nan Tzu [M]. Shanghai: Kelly & Walsh; London, Kegan Paul, 1933.
- [22] Morgan E S. 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 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 Taoist Philosopher with an Excursus, and Copious Annotati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 Shanghai & Hongkong: Kelley & Walsh; Kellye & Co.; London: Trubner & Co, 1881.
- [23] Chan Wing-Tsit.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 [24] 陈广忠. 淮南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25] Ames R T. The Art of Rulership: 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 [26] 白光华. 我对《淮南子》的一些看法[C]// 陈鼓应. 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192–199.
- [27] Ryder E. Philosophy of Peace in Han China: A Study of the Huainanzi Chapter 15 on Military Strategy [M]. Taipei: Taipei Ricci Institute, 1998.
- [28] Meyer A. The Dao of the Military: Liu an's Art of War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 [29] Kunst R. More on Xiu 宿 and Wuxing 五行, with an Addendum on the Use of Archaic Reconstruction [J]. Early China, 1977(3): 67–69.
- [30] Michael F, Michael L. Once Again: The Concept of Wu-Hsing [J]. Early China, 1983–1985, 9/10: 218–219.
- [31] Major J S. Myth, Cosm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Science [J].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978(5): 1–20.
- [32] Lau D C, Roger T. Ames. Yuan Dao; Tracing Dao to its Source [M]. New York: 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 1998.
- [33] 安乐哲. 自我的圆成: 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
- [34] 李增. 淮南子[M].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印行, 1992.

From “Footnotes of *Laozi*” to “Thematic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The Selected Translation of *Huainanzi* in the English World

CHENG Yue^{1,2}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Written in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Huainanzi* is a masterpiece which synthesizes the ancient thoughts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It is also the last work with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before Confucianism taken as the official ideology in the Han Dynasty. It is of great valu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s, culture, and history.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Huainanzi* in the English world began in the 1880s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40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selected translation has been the main form of translation of *Huainanzi*,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research and influence of *Huainanzi* in the English world. The selected translation of *Huainanzi* has gone through two stages, “footnotes of *Laozi*” and “thematic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dicating a clear developing trend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ranslation-cum-research, reflecting the basic attitude and cognitive level of the English world towards ancient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study of selected translation activity can not only demonstr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value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of *Huainanzi*, but also revea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inology,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ur domestic translation activity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 *Huainanzi*; selected translation; English world; translation-cum-research